

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郭震旦

摘要: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依托苏醒的中国史观,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主体性实践。西方汉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并向中国学界展示了摆脱西方中心论后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发中国史学所蕴藏着的无限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中国史学;主体性;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海外汉学;文化本质主义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4.10

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叙事为普世主义所规制,渐渐与自身的发展轨道相乖离,这使得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一直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现在,中国的复兴正以新的语汇改变着她自身的历史结构,中国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正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史学的主体性正在崛起。近年来日渐强烈的史学本土化主张就是其表征。“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以欧洲中心论为基调的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正在全球范围内瓦解,新的世界历史叙事范式正在形构,而中国史学主体意识的崛起,正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一个刷新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刷新历史叙事的过程。史学主体性的崛起,必将更新中国的历史叙事,并推动中国史学开启建构新范式的大幕。

一、时代催生出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以五种生产方式为基干的中国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合法性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确立的,革命的正当性赋予了这种叙事方式的正当性。本质上,它反映的是在革命语境下现实与历史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中国历史的主基调被描绘成血腥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大规模的阶级对抗,显而易见,这种叙事框架暗含着对古代中国的否定。它是曾经的现代化追求苏联化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来自欧美的历史发展观念也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标尺,“欧洲是先进的中心的,中国是落后的边缘的”,成为臧否中国历史进程的先验依据,欧洲中心论遂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集体无意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实践正在要求现实与历史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其背后的逻辑是:现在的中国强调走自己的道路,这就必须唤醒在普世主义历史叙

事框架下休眠的原生历史；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时代主题，要求与之相呼应的历史叙事。在普世主义的语境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是以否定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而在特殊主义语境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则是继承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这场改变十几亿人命运的改革开放，被定位为文明的复兴，过去不再被简单地视为革命的对象，也不再是现代中国的负资产，反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故乡和发展凭据。雅斯贝尔斯曾富有诗意地写道，“当下是通过对我们自身起作用的历史基础而得以实现的”，人类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我们和我们的当下处在历史之中，如果当下在今日狭隘的视域之中堕落成单纯的当下的话，那么它就会丧失其深意。如果我们抛弃历史，那么历史上所有的飞跃都将成为假象^①。这就是将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联系起来的最深层原因^②。

既有的经验表明，一国的历史叙事总是由对该国社会形态的认知所决定。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影响着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例如，斯大林的单线历史发展图式为了突出革命的作用，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意义，完全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虽然它在一个时期似乎发挥了强大的政治作用，但从这里引出的阶级斗争万能论和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终于变成一种自我思想禁锢和僵化的教条原则，阻碍了苏联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严重滞后了体制内部的改革与创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实践也表明，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同样决定着现实政策的推行，正是由于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来判定中国社会性质，在建国初，中国急于宣布已经完成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大跃进来赶超英国和美国。晚年毛泽东由于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之间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失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这一理论在主要方面都切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目的就是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退回到中国作为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境况中去，并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来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④。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正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深刻把握之上。

“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原有的理论如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时代就要召唤新的理论”^⑤。早在1986年，苏秉琦先生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史学主体性崛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视，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诉求，因为我们“要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必须了解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灵魂、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什么^⑥。只有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衬托下，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才能显现它的剪影。

“‘过去’总是为当前行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正当化需求而被认领”^⑦，这种观念的调整充分体现在意识形态对历史的看法上。习近平多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⑧，“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由我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4、3、320页。

② 王康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黄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③ 罗荣渠：《新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④ 参见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⑤ 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⑥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77—178页。

⑦ [美]帕特里克·格里著，罗新主编：《历史、记忆与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⑧ 习近平：《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光明日报》2019年1月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中，习近平也曾说道：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①。这些论述表明,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历史已从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海外学术的刺激也助推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而论,中国都是一个超大规模文明体。中国的强势崛起,正促使世界学坛有关中国的理论创造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状态。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迅速增长的综合国力本身正在生成多重意义,在此背景下,东西洋学者都在创发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就此展开了一场解释中国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中国遗憾地处于缺席状态^②,这样一种局面凸显了建设中国主体性学术的紧迫性。近年来,学术界启动“何为中国”的讨论,就是为了以“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意识”来参与这场解释中国的竞争。当下,来自海外的一些新理论对中国史叙事提出了很多挑战。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断言,很多庞大的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主张弃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施坚雅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来取代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和韩国则强调亚洲史、东亚史,试图弱化中国与中国史;尤其是“新清史”刮起的旋风,更是对历史的中国提出强力质疑。中国史学界关于“何为中国”的讨论,目的就在于迎接这些挑战,在全球史、区域史浪潮中,坚守国别史的意义,坚持将中国当成一个完整的、单独书写的历史世界,当成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文化和历史的书写单位。正如论者所诘问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民族国家里面去拯救历史,而不能在历史里面来理解民族国家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别人的尺度来界定民主国家,而不是用我们的尺度来界定别的民族国家呢?”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诘问,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学战的问题,学术之间也是战争”^③。

一些学者再三呼吁“不能丧失历史的主体性”^④,要“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⑤。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背景之下,虽然不能过分突出自我认同,过分强调区别“他者”,但现在学术界的大问题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下,许多人被西方思潮牵着走,越来越丧失了本土观察的眼光和角度,被“化”过了头^⑥。

上述分析表明,对国际学术界进行回应,与西方学术对话,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不可回避的责任。如果中国学者不能从主体性出发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那么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就只能沉默地任由外部世界来评说,只能在有关中国的思想市场上做一个看客,而不是成为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此有学者倡言“要有‘解释中国’的自信”^⑦。

彻底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从成为史学主体性崛起的内在动力。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新思潮、新理论的输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形式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⑧,这从根本上赋予了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一种“移植品格”^⑨。正是在这种“移植品格”的规定下,中国学者习惯于以先验的合理性或正当性不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根据西方的既有理论概念对这些研究及成果作“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② 葛兆光:《缺席的中国》,《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

③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贵州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

④ 汪荣祖:《历史的主体性不能丧失——美国学者“新清史”的危害给中国史学研究的又一次警示》,《北京日报》2016年12月12日。

⑤ 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

⑥ 葛兆光、张瑞龙:《新思想史研究、历史教科书编纂及其他——葛兆光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

⑦ 葛兆光:《要有“解释中国”的自信》,《解放日报》2007年8月22日。

⑧ 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⑨ 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或“切割”^①。

这种情形在史学领域表现得十分典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史学突破传统范式与西方理论接榫的过程就是放弃主体性的过程。郭沫若就曾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奴隶制这个问题，我敢十二分坚决地主张：中国也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②即使有人坚持中国历史有特殊性，那也是在既有框架下的微调，不敢越五种生产方式说雷池之半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是否有无奴隶社会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一个政治命题，如果坚持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讨论中存在的草率和随意充分表现出学术丧失主体性后的轻浮与浅薄，也充分展示出按图索骥式研究那份捉襟见肘的窘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奴隶社会的讨论中，对奴隶身份的认定就存在着匪夷所思的简单和鲁莽^③。对奴隶社会某些问题的探讨，可作为一国学术丧失主体性后千方百计比附西方理论的标本。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只能被看作是“以现代欧美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远端部分——如果不是外围部分的话”^④。

德里克早就对由普世主义叙事与中国历史之间的紧张所造成的困窘作过论述。按照他的观点，五阶段分期模式“对于揭示和解释此前的史学家所忽略的中国史学中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五阶段论的分期模式和中国历史演进实况的不相符，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内部充满了张力”。“将‘普世的’模式强加于中国历史，结果（只能）是对理论概念和中国历史解释的双重简化”。在德里克看来，对历史普遍性模式“固执的坚持”，限制了中国史学家“创造性地解释他们所发现的历史资料的能力”，“即使是那些理论纯熟，研究细致的史家，也未能克服那些干扰他们对其理论假定进行反思性分析研究的障碍”，“他们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先入之见，妨害了他们对其所发现的历史资料的解释，最终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⑤。

当下，这种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并未稍减，史学界“追赶西洋和模仿东洋已经到了‘彼进于此，我必随之’的地步”^⑥，“以至于没有了‘中国’”^⑦。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普遍的反思，一些学者由此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中国性”，坚持历史研究中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认为只有“让历史说汉语”，才能在普遍历史中给“中国史”占一个座位，提高中国的“历史配额”^⑧。正是出于相同的考虑，一些学者不断呼吁史学本土化，将本土化视为重新铸造未来中国史学典范的根本之路^⑨。

二、主体性思维崛起及其实践

观念总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开放后中国史观的回归，无疑是中国史学思想最有意义的事件。主体性思维的崛起及其实践，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进程的一条主叙事、主线索，抛开这条主叙事、主线索，我们就难以理解近四十年中国史学的变迁，也难以从深处把握当代中国史学的演化大势。早在1979年，被压抑已久的中国史学主体性就开始从蛰伏状态中躁动，标志性事件就是黄现璠所撰长篇小说《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经过万般艰辛和冲破层层阻力”^⑩得以发表，在

① 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

② 郭沫若：《驳〈实庵字说〉》，《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80页。

③ 详参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第五章“释众”、第六章“释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77页。

④ 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第3页。

⑤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3、211—212、195、213页。

⑥ 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文史哲》2011年第3期。

⑦ 葛兆光：《历史学四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⑧ 葛兆光：《历史学四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⑨ 王学典：《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改革开放40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⑩ 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第242页。

这篇文章中,黄现璠大胆宣布:“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此文的面世,揭开了改革开放后史学界挑战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从西方话语中打捞中国历史”的大幕。其后,黄氏在广泛使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历史语文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的基础上,以所积四十年之功,于1981年写成《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对有奴隶社会说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辩驳。在这部六十余万言、直到2015年才得以面世的长篇大作中,黄现璠反复申言,所谓奴隶社会,在中国古史中纯属子虚乌有,它是主观教条主义强加给中国古史的东西,或是将似是而非的概念张冠李戴到中国古史的伪说,或是全然不顾我国史册记载的古史事实而利用唯我独尊的话语权将自己牵强附会的伪知识假学说硬灌给青年学子以达欺世盗名之功的谬论,绝不可信^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部书稿中,黄现璠屡次呼吁要以“中国中心观”来取代那种“习惯于拿西洋古代史来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标准和参照标本”的“西方中心观”^②。这比后来成为标签的出自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要早了许多。

其后,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积极响应黄文,纷纷撰文否定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一个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高潮,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无奴学派”。“无奴学派”对史学界盛行已久的教条主义思维形成重创,冲击了学术研究“公式化”的格局,破除了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观”,因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主体性崛起历程中占有特殊地位。

1988年7月,由国家教委等单位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烟台召开。会议的主题是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普遍必经的阶段”成为会议共识^③。“对于中国古史学界来说,对‘五种生产方式说’进行剖析的焦点在于存不存在所谓的奴隶社会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④,对奴隶社会的否定,拆解了五种社会形态链条最关键的一环。

苏秉琦也很早就表现出建构中国主体性历史的强烈愿望。1981年,苏秉琦提出建立考古学“中国学派”^⑤的主张,在他看来,把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是中国历史学存在的一个怪圈,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全部的历史,只能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他将中国古史的框架和脉络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就是为了证明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的口号,所谓重建,就是针对他所称的过去那种“将社会发展史和手里的考古实物简单相加的做法”^⑥。

与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相伴随的,是对中国存在封建社会说的持续质疑。1986年,何新发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认为“五阶段社会发展公式”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是“单线演化模式”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中国史学界称秦汉以后为“封建”时代,是硬套欧洲历史模式所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⑦。1991年日知在《“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一文中明确指出,将feudalism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对应起来是一个误译,在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1999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基调就是否定中国存在封建社会。2006年,冯天瑜《“封建”考论》问世,遂将“封建社会”讨论推向高潮。冯书以历史语义学为工具,试图证明“封建社会”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概念“误植”。学界围绕冯书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计有2006年10月在

① 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第320页。

② 参见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第320页。

③ 《一九八八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纪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④ 晁福林:《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⑤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8页。

⑥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4—5页。

⑦ 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读书》1986年第11期。

武汉大学召开的“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2007年10月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研讨会,以及2008年12月在苏州召开的“‘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研讨会。2010年5月,《文史哲》杂志举行“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并开设专栏,专题讨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讨论的基调也是反对中国存在封建社会。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讨论在这一年达到高潮,甚至被列入“2010年十大学术热点”^①。2011年,《史学月刊》第3期组织“秦至清社会性质的方法论问题”笔谈,试图从方法论方面探索社会形态研究的突破口^②。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学者否定秦至清的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而少数坚持封建说的批评者们,“却和几十年前比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和进步,仍然局限在他们自己所理解(其实是幻想)的教条主义框架内部,做自我陶醉式的概念游戏”^③。

作为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何兹全也在晚年放弃了对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坚持,他将战国到秦汉的中国古代社会概括为私家主体社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奴隶社会这个词不科学”,“会引起许多繁杂的争论,无益于对历史客观真实的认识”^④,应该“束之高阁”^⑤,彻底放弃。他充分理解学术界对社会形态研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状况所表现出的“淡漠甚或腻烦情绪”,主张研究中国历史应该重事实,重材料,少定框框,在事实没有摸清楚之前,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应该先让中国史料说话^⑥。

作为近代经济史领域的专家,李伯重主要对资本主义萌芽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是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为默认前提的,以往所认为的西欧大陆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并未经过验证,从方法论上来说,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仅仅只是想要证明西欧大陆在中国土地上的重现,而不是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点。“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按照欧洲的经验来构建中国的历史,只有摆脱了这种情结,我们才能够不带偏见、实事求是来了解中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探索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⑦。

更多学者则从总体上对普世主义历史叙事进行理论反思。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荣渠就提出“一元多线史观”来突破“单线史观”的迷障。他指出,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格格不入,将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解释为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规律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中国历史走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⑧。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田昌五晚年集中论证了中国历史与西方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之间的矛盾,藉此构筑新的中国历史体系。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一种最正常最纯粹的发展形态,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中国历史的规律,用任何模式套改或剪裁中国历史都是错误的,中国历史既不是什么西方型的,也不是所谓东方型的,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型的^⑨。他用中国历史大循环的理论,

① 《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

② 这组笔谈包括冯天瑜《“封建”名实之辩的方法论问题》、张金光《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李若晖《关于秦至清社会性质的方法论省思》、李振宏《从国家政体的角度判断社会属性》、黄敏兰《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叶文宪《走出“社会形态”的误区,具体分析社会的结构》、李治安《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符合建构》等文章。

③ 聂长顺:《关于封建的中日对话——谷川道雄、冯天瑜讲谈录》,叶文宪、聂长顺主编:《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41页。

④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8页。

⑤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1页。

⑥ 何兹全:《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

⑦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修订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35、14页。

⑧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⑨ 田昌五:《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来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独立地向前发展的,在近代以前,她单独构成了一个世界,并形成了中国文化圈^①。

秦汉史专家张金光的主体性情结更是浓重。他认为,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大都是舶来品,“五朵金花”的讨论,不是为了从中发现实在的中国历史逻辑,并创立符合与之相符的理论分析范畴、概念,而只是为了证明现成理论预设的正确,最终只能削足适履,终日徘徊于五种生产说的既定框格。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研究应力求走出西方历史中心论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笼罩之困境,深入中国历史实践,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模式^②。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回归中国本体,用中国历史观重新建构中国史叙事体系,已经成为史学界的集体自觉。近四十年来,从远古到近代,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每个链条都被重新审视,以“欧洲中心论”为基调的普世主义历史叙事大体上已经解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形态研究应当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只有通过研究归纳出中国历史研究中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范式,才能重建中国史叙事的理论体系^③。

正是凭借观念上的突破,众多史学家展开了主体性史学的实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简帛材料和考古资料的发现,众多考古和中国上古史研究学者投入到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的研究中。1986年至2000年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多达800余种。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重建,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并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夏鼐、苏秉琦、李学勤、张忠培等众多学者都从考古学上肯定了中国文明的自成一体,并尝试建构中华文明演进的总体脉络和时空框架。

由官方组织的一些大型学术攻关项目也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中国本位叙事模式的支持。无论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具有“阐释中国独特的历史演进道路的意义”^④。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制定文明起源的标准时,不再拘泥于西方制定的以文字和金铜冶金技术作为文明产生标准的做法,转而根据对中国古代资料的实证研究,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此举不仅向外表明中国自古走的就是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还显露出从中国材料出发构建中国早期文明研究话语体系的努力。

社会史的复兴本质上代表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推动中国史叙事本土化的重要实践和主要趋向。走向田野与社会,回到历史现场进行“在地化”的考察、体验和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规范。强调本土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与技术向历史学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史研究大规模移植与渗透。中国史重返故土在社会史复兴中得以实现。入江昭就明白无误地指出,无论是“社会转向”,还是在“文化转向”,都是“强调一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例外性”,“强调一国一地独特的‘本土化’的国民气质和‘心态’”^⑤。

史学家们纷纷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系统。田昌五致力于构建新的中国历史体系,提出中国历史可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等三大时代;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直线式运行的,而是周期性循环演进的。张金光从其“实践历史学”理念出发,依托一系列独创的范畴、概念,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初步构建了一个奠立在历史实证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理论分析体系和叙述方式。晁福林提出“氏族—宗法封建—地主封建”的社会

① 田昌五:《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第20页。

② 张金光:《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文史哲》2010年第5期。

③ 张国刚:《本土化:重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④ 王和:《关于“中国路径”源头问题的新思考——〈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意义和启示》,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7页。

⑤ [美]入江昭:《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与未来》,邢承吉、滕凯伟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5页。

形态说,叶文宪提出了“酋邦时代—封建王国(或王国)时代—王国与帝国的转型时期——专制帝国时代”说,王震中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冯天瑜提出了“原始时代—封建时代—皇权时代—共和时代”说,李若晖提出从秦到清是“郡县制”,何怀宏提出从秦到清是“选举社会”,这些都是主体性中国史叙事的重要尝试。李伯重提出的“江南道路说”,勾勒出不同于西方的一条中国近代化之路。曾力主“战国封建说”的白寿彝先生在主编《中国通史》时谨慎地避开了古史分期问题,代之以只有时间意义的“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主编的《中国大通史》则公开宣称“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并且“避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具体的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如均田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租佃经济等,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约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①。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也直白宣布已经放弃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套话语系统。

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也重新得到重视。一些学者提出,“可以尝试从中国古史传承脉络里寻找替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以此作为解释自身历史演进变化的依据”,通过复活“中国”“大一统”“封建”“经世”“道统”“夷夏”“文质”等概念的本意,重新发现中国人文学的精髓。对传统概念的这种处理,“不是把他们当作验证西方进步概念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真正视其为建构中国新型历史叙事的可靠资源”^②。一些海外学者细心地观察到:“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复苏的民族自豪感的高涨,人们对古代传统的兴趣得以复兴”^③，“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批判与责难后,这些学者似乎很高兴有机会重新审视过去,把中国的过去视为有生机并有助于发展和演进的源泉,而不再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④。对此,德里克表达得更加明确,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即已出现“作为中国认同的组成部分的本土化实践的复活”,“始自1993年的重振‘国学’的努力,就标志着坚持保守性的——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本土性的——态度去寻找学术研究的‘中国式’道路”^⑤。有学者斩钉截铁地预言:“今后在中国史学界,就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来说,涉及这一问题——即人类历史进程究竟是否表现为统一模式、‘五种社会形态’究竟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的有关争论,大体上可以给出否定的答案,并就此告终。”^⑥

一些学者已经把主体性崛起当作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思想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人们开始直接面对自身民族的历史过程进行理论抽象,尝试用本民族的语言概念来阐述自己民族的历史,即开始了一个自觉摆脱用欧洲历史模式解读中国历史的思想行程”,“这标志着中国学人开始进入一个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时代,一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的时代”^⑦。

三、西方汉学对中国史学主体性思维的刺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全球化、民主化浪潮的演进,欧洲中心论受到来自西方学术世界内部的强烈冲击,西方学术进入范式更替的新世代,这一学术思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使美国中国学出现范式扩散的趋势,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就是在这一趋势中应运而生。突破欧洲中心观的

① 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杨念群:《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基于当代史学现状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③ 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第102页。

④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2页。

⑤ [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⑥ 王和:《关于“中国路径”源头问题的新思考——〈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意义和启示》,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1卷,第301页。

⑦ 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1卷,第73页。

美国中国学新势力取得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随着这些成果的传入,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与国内正在上升的史学主体性思潮产生共振,极大地刺激中国史学主体性呼声的高涨。谈到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在任何意义上,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都是一个绕不过的存在,1989年,该书中文版甫一出版,“就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震撼”^①。从此,中国中心观不胫而走,至今仍是史学界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有学者为此写道:“‘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②。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要义在于:力图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总之,“中国中心观”要求的是“一种根植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柯文直接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的过去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也不能以中国为中心。这无异于给了从未意识到范式危机的中国史学家当头一棒!

2000年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文版的问世也对“中国中心观”的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书以极具挑战性的姿态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其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神话”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认为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该书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巨大轰动效应,虽然其中一些观点在大陆学者看来像天方夜谭^③,但其颠覆西方中心论,甚至以中国为中心重构世界历史的做法,却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观念上的强烈冲击,使中国学者重新看待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上地位,不再把中国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尤其是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中国学者“振聋发聩的提示”,正是由于弗兰克的榜样,使中国学者“领悟到还有其他看待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④。

对中国学者来说,对构建主体性史学最具启发意义的恐非黄宗智莫属。华人身份以及长期生活在大陆学术圈,尤其是在华北及江南经济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不同凡响的成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研究中国的方法论价值及意义。1993年,他在《史学理论研究》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指出从西方理论来看待中国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是悖论的,也就是说从现有理论上看来是一对相互排斥的悖论现象,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并存和真实的,比如“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市场化)”“集体化下的过密化”以及“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这些都是与经典理论预期不相符的社会经济实际,是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实际,需要学术界重新理解和概括,这就意味着长期以来由西方经典社会科学理论所主宰的中国研究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范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创建新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该文一出,立即引起大陆学界广泛讨论,《史学理论研究》连续五期发表文章予以回应,专题讨论该文的学术会议也次第召开。该文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西方现有理论研究中国实践在功能上的穷困,并预示着根植中国本土的理论创造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近二十年来,黄宗智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用能够准确掌握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来形成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念和社会科学”^⑤。在他看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挑战在于:怎样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

① 雷颐:《批判精神的内化》,[美]柯文:《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页。

② 罗志田:《在中国发现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参见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

④ 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⑤ [美]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他建议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从实践出发去建构中国研究真正需要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① 黄宗智所努力的,正是中国史学主体性实践所要寻找的道路。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像黄宗智这样在中国研究中贯彻理论自觉如此彻底的人,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中国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他对此一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和概念化的过程。他选择的是“从经验证据到概括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这是一条带有典范性的“黄宗智路线”,足以作为探索中国主体性史学建设之路的方向标。

对中国学者来说,滨下武志从亚洲主体性出发同欧洲中心论的对抗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相对于已固化为模式的从西方视角来看东亚,滨下武志反其道而行,从亚洲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亚洲经济圈理论。在他看来,亚洲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它不是东方对西方亦步亦趋的一个结果,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市场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从对亚洲自己的认识中寻找本身的位置。他认为,中外学者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每每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但是,对于中国和亚洲近代史的研究,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冲击一回应模式,并不能很好的检视亚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西方的规律是适合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的,但未必适合于东亚世界。滨下武志强调,应超越那种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②。滨下的研究提醒我们,即使在全球化格局中,亚洲仍是一个坚硬的存在,欧洲的光晕淡化不了亚洲的身影。

无论是柯文还是黄宗智,无论是弗兰克还是滨下武志,他们将中国历史放到西方中心论的对立面上,或许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立场,或许也难以完全脱离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瓜葛,但是,他们的意义在于,向我们展示了摆脱传统的主流西方中心论来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

四、警惕主体性崛起背后的陷阱

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所谓文化本质主义,是指“把某个文化极端地化约为某些价值观或特色,并相信其他文化不可能经验同样的价值观和特色”^③。从本质上说,文化本质主义是机械性排外的,它过于简单的对待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简单地归结为“我们”和“他们”的对抗,所以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本质主义的‘西方’和‘本土’,就像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样,看似对立,实则是一体之两面。”^④由此,我们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

其实,作为“中国中心观”的发明者,柯文早就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刻反省。他认为虽然中国中心观有广泛的适用范围,但在某些议题上并不适用,这些议题“以各自的方式对于中国中心取向的适切性提出挑战”。当历史学家尝试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群时,如果过分强调彼此的文化差异,不但使他们难以掌握文化性格复杂和互相矛盾的元素,也会让他们难以理解文化所经历过的变迁。柯文强调,某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法

① [美]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② [日]滨下武志:《全球化与东亚历史》,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外关系史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30页。

③ [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

④ 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5页。

面,突破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①。

或许应该承认,当前一些领域的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了文化本质主义的苗头。德国汉学家柯马丁就批评国内早期中国研究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例外论。他认为与其说这是学术观点,不如说它是政治观点。柯马丁对当前早期中国研究中的本土主义与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认为研究早期中国必须借助国际化与比较性的研究进度,而非限于单一主义和单一文化的中国中心观,后者蕴含的本土主义立场不仅是一种保守的防卫姿态,最终更会造成其自身的自我边缘和自我挫败。柯马丁指出,为使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中国研究获得保护与优先权,在“本土国学”和“海外汉学”之间人为制造两极对立,乃是一种前现代与反批判的思维,这不会是能够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也不会是任何一种文明研究可以为继的出路^②。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按照美国学者柯伟林的看法,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早已经融入全球体系中,“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无论是就知识、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中国都始终是一个不断地卷入国际化大潮的大国”^③。自民国建立后,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加以考察,那就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④。

台湾学者杨国枢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中,曾经提出“本土契合性”的理论,意在彰显本土人在研究本土时相对于局外人的优势。或许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有的研究表明,局外人有时可能比本土人具有更大的优势。柯文就认为,“承认历史学者的局外性虽然是个问题,但同时也是让我们与历史当事人有所不同的关键。此一差异让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可以提供历史当事人所没有的认识观点及意义”^⑤。也就是说,局外性可能是劣势,更有可能是一种优势,它可以使历史学家看到当事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一点也能够从近年来美国中国学带来的诸多启发得到印证。我们对中国史学主体性的追求,绝不能以否定域外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可能性为前提。在柯文看来,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可能比中国史学家更具有某种优势(或更广义地说,历史学家可能比历史直接参与者更具有优势),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局外性,才使得他们不同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得以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再现当事人所无法知晓的并且具有意义的过去。不论是美国学者描述中国历史,还是一般历史学家叙述一般的过去,局外性都不只是起到扭曲的作用,还可能起到阐明和启发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局外性对历史进行最大的阐明和最小的扭曲”^⑥。

“加州学派”的研究理路似乎对我们有特殊的借鉴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彭慕兰、王国斌等人在研究上,一方面拒绝欧洲中心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简单化地乾坤倒转,“鸠占鹊巢”,把中国推上欧洲中心论曾经占据的位置。加州学派善于通过比较来实现观点和理论的创新,以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为例,该书的特点在于,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又不拒绝欧洲经验,把中国与西方都放到一个平等的框架中去分析,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达到更客观的历史认识。王国斌在为弗兰克《白银资本》所作的序言中曾经写道:“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

① [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

② [德]柯马丁:《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③ [美]柯伟林:《序言》,柯伟林、牛大勇主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化、内化与外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④ [美]柯伟林:《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⑤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63页。

⑥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89页。

之间的关系。”^①这恐怕也反映了加州学派自己的治史理念。

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或许是我们建构主体性学术的一条必由之路。海内外许多成功的研究都表明，选择开放的比较视野才能为封闭造成的自我蒙蔽去魅。欧洲中心论的破灭，正是建立在视野扩大基础之上，它也是欧洲获救自身真实历史的开端，同样，我们要获得真实的自主性叙事，也必须将眼光投向世界。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史本身也具备了世界史的意义，这是必须谨记的。

柯马丁就认为，中国汉学研究未来唯一可能的，是中国文明的精深研究与广泛比较研究的结合，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如果预图对整个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就必须了解更多其他古文明，才能更清楚地看待古代中国。柯马丁不无警告地指出：“文明的国际性研究将永远不会听命于民族主义的规划”^②。

毋庸讳言，当前史学领域的本土主义带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主义的本土主义，极有可能造成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歪曲。普世主义叙事可能导致中国历史的扭曲，我们也不能排除从狭隘的本土主义出发扭曲中国历史的危险性，如果实用主义的偏狭占了上风，本土主义的诉求营造的就只不过是一个缺乏诚实的乌托邦幻象。

正如许多学者所倡导的那样，中国史学应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国经济史以及早期中国研究等许多领域早已经是全球性和国际性的了，这种学科性质决定了研究的国际视野不可或缺，如果硬要闭门造车，学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当今世界，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好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不留意国外同行正在说什么、做什么时候”^③。

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简单地因为欧洲中心论的嫌疑而排斥西方理论，因为现今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黄宗智一直反对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盲目地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但他同时也认为，我们的研究不能停顿在仅仅“证伪”西方的理论，那样仍然只是做其“脚注”。由于中国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没有太多的积累，我们仍需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来建构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中国的经验实际来与西方理论对照（对话），由此鉴别其中对中国实际有洞察力的和没有洞察力或错误的部分，这样既可以借助于它又可独立于它。在黄氏看来，绝对的中国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一样，都是中国研究的陷阱，比起西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对中国研究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因此，他更倾向于综合不同理论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来理解实际。他认为全盘西化和全盘中国化都是不可持续的途径，最好的办法是在两者之间探寻建设性动力，根据关乎中国实际的经验证据而追求融合与超越^④。这些观点足可供我们在从主体性出发处理和西方理论的关系时借鉴。

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建构自主性学术的困难，当今的理论世界，“西方全面占据原创权和制高点”，亚洲的思考和声音往往被西方遮蔽和淹没。有学者认为，亚洲要想拥有思考与声音，必须“提出超越现代理念的原创理念，掌握这个最重要的原创权”，“在大量具体领域产生重要原创理论”，“在实践上赶超西方”^⑤。这是每一个张扬主体性的学者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以笔者的浅见，虽然经过四十年的追赶，如今中国现代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可能结构性地拉大了。最近数年，西方学术在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等新潮理论的冲击之下，实现了自我更新和调整，使西方理论表现出此前世代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渗透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使得西方学术的研究能力更加强大。科学正在给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新的方法和理论，又一次展示出统一一切知识的雄心。以史学而论，在演化生物学、大数据

① [美]王国斌：《序言》，[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② 盛韵：《柯马丁谈欧美汉学格局》，《上海书评》2012年3月31日。

③ 李伯重：《史潮与史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④ [美]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32—33、179、683、689页。

⑤ 邓曦泽：《亚洲为什么缺乏思考与声音》，《联合早报》（新加坡）2019年2月11日。

技术、基因技术的推动下,过去一些无法想象的人类历史的难题(比如人类的演化及走出非洲的过程)正在得到解决。史学正在重新科学化,过去像一个被冷冻的胚胎,正在科学技术的召唤下复活。对这一趋势的热切期待,可以从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合著的《历史学宣言》中表现出的那种对史学久违的乐观主义中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引进,多停留在介绍和传播阶段,具体实践则力有不逮,很少有典范性著作问世,个种原因恐怕就在于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因此,正视中西之间的学术差距,培养自主性学术需要的生态,尊重学术创造的科学逻辑,可能是我们首先该做的。

探寻中国主体性已成为中国当下思想最重要的使命之一。邓正来指出,中国不应该只成为一个“主权性中国”,还应该成为一个“主体性中国”^①。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建构,无疑是“主体性中国”的一部分。世界史学的新潮流,无论是已形成范式的全球史,还是风靡世界的新文化史,其前提都是基于对欧洲中心论的摈弃。世界史学正在经历一个欧洲中心论被打散之后重整的过程,几乎所有的范式更新都是以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前提的,是突破欧洲中心论后结的果实。欧洲中心论的瓦解过程就是各国家各民族史学自主性主体性崛起的过程。虽然我们绝不赞同那种狭隘的文化本质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学术,但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无疑会修正甚至颠覆现有的欧洲中心论所营造的那种中国“认知图示”。中国现代史学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但在大多数时间内,它不过是西方普世主义叙事的回音壁。所幸,相对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不过是一个短暂插曲。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布罗代尔曾经写道,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始终有一个新大陆有待发现”^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发中国史学蕴藏着的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 李 梅]

① 邓正来:《批判与回应——寻求中国法学的主体性》,《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②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活力(代译序)》,《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vii页。